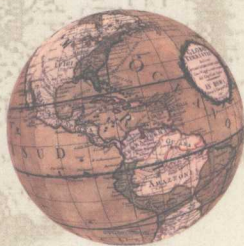


跨文化研究译丛

周宁主编



世界历史中的中国

China in World History

[英] S.A.M.艾兹赫德 著

S.A.M.Adshead

姜智芹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跨文化研究译丛

周宁 主编

世界历史中的中国

China in World History

[英] S.A.M. 艾兹赫德 著
S.A.M. Adshead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历史中的中国: 中、英/[英] 艾兹赫德(Adshead, S. A. M.) 著; 姜智芹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书名原文: China in World History
ISBN 978-7-208-08552-7

I. 世… II. ①艾…②姜… III. 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中、英 IV. 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5505 号

策划编辑 曹洪燕
责任编辑 曹洪燕
装帧设计 王小阳



世界历史中的中国

S. A. M 艾兹赫德 著 周宁 主编 姜智芹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张 30.5
插页 2
字数 356,000
版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552-7/K · 1553
定价 59.00 元

总 序

周 宁

西方现代性留给我们的思想陷阱，不在观念本身，而在观念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你将启蒙哲学与西方现代扩张历史对读，就会发现知识与权力危险的合谋。跨文化研究解构现代性宏大叙事，诸如理性、自由、民主、文明、进步之类具有普世道德主义意义的宏大观念，实际上都是西方现代扩张的意识形态，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事业服务。自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自由是西方权力的工具；进步之所以有益，是因为进步可以支持扩张。跨文化研究视野下的批判理论解构宏大叙事，为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提供了辩证的否定面，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西方现代性的缺陷，又可以发现其活力。

西方现代知识体系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为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提供想像的基础的同时，也为西方殖民扩张提供有效的意识形态。后殖民主义理论批判自由主义史学构建的宏大叙事，认为自由不仅不是西方的历史事实或历史理想，甚至可能是历史骗局。戴维·格雷斯的观点并未如此极端，《从柏拉图到北约：西方的敌与我》开篇所谓“自由之所以生长和发展，乃是因为它对权力有益”，并不意味着全书的主旨。他不过是想用新、旧西方的历史检验历史哲学，证明自由在西方历史中的复杂意义。西方并不是惟一的，对世界不惟一，对自身也不惟一。旧西方是古典文化、基督教和日耳曼因素的综合体，理

性、民主、资本主义的新西方，更是一系列突变的累加成果。西方以自由为核心的标准历史叙事是片面不完整的，自由作为一种历史中的实践和制度，并不等同于西方身份，自由成为西方特定的“本质”，是特定历史话语的产物。西方就是西方，不是世界本身，更不是世界的未来。

跨文化研究提供一种超越的视点解构西方现代性，从逻辑前提与价值根基上颠覆现代知识体系，全面而彻底。现代性思想试图在一种理想的时空框架中为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建立一种“观念秩序”：世界的空间分为东方与西方，是二元对立的；时间从过去穿过现在通往未来，呈三段式进步。西方现代性为世界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观念秩序，进而塑造世界的现实秩序。这种观念秩序以线性历史观和元地理学为基础，为现代知识规定了明确的时空框架。地理学者马丁·刘易士和历史学者凯伦·韦根合著的《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分析“隐秘的权力地理学”，从元地理学批判开始，挑战了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世界地理知识体系。元地理学是一种无意识的空间结构，通过它人们不仅构建起关于世界的知识，引导着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科学甚至博物学等学科的研究，而且，还发挥着国际政治领域中的意识形态权力。西方现代思想将地球随意分成大洲，东方与西方、北方与南方，都不是简单的地理学概念，而是文化与地缘政治利益的隐喻，“元地理学神话”在源头上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痕迹。

帝国主义权力缔造的专横世界观念，业已成为当今世界公共知识架构的基础，这是跨文化研究面临的所谓现代性精神结构的困境。你无法在公共知识架构之外讨论问题，除非你不以知识的方式讨论问题。跨文化研究试图超越西方现代性的精神困境，克拉克的问题是，如果萨义德从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关系的理论出发揭示东方主义令人畏惧的权力结构，“反写”了西方文化霸权体系，那么，东西方文化

关系的希望面是什么，东方主义话语是否潜在着开放性以及东西方文化是否有互动互惠的可能性？《东方启蒙：东西方思想的遭遇》关注东西方之间跨文化交流的建设性问题，历史上东方思想曾经在科学、伦理、宗教、神秘主义和哲学等领域里，激起过西方深刻的反思，构成西方文化矫正启蒙理性的“他者”智慧。海德格尔说现代是一个“世界图像”的时代，这个图像的时间维度是古代、现代与未来，空间维度是西方与东方。西方现代性在这种“世界图像”中获得自我确证的整体性想像。克拉克具有肯定东方思想的诚意，但依旧在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元地理学”神话中讨论问题。

西方现代性从观念上规训世界的方式耐人寻味。在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历史与世界体系中，不了解西方就不了解世界，同样也不能了解中国。艾兹赫德的著作《世界历史中的中国》将中国历史当作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分析中国同西欧亚、非洲、美洲三大文明的关系，以及中国在西方规划和建构的新兴世界秩序的地位，尽管强调中国历史对生态、政治、文化和技术等新兴世界体系诸多方面的贡献，但分析框架依旧是比较现代化研究，离不开西方现代世界观念秩序。世界历史进程表现为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在此进程中西方现代性实现其“世界命运”。作者分析“世界历史中中国的意义”，眼界是世界的，视角与价值仍是西方的。解构西方现代知识体系，关键在于揭示西方现代性话语中所隐藏的“令人生畏的结构”，其危险与诱惑已经深入我们的文化无意识。不仅西方学者无法摆脱，中国学者也难以逃避，因为你无法不在现代性知识框架内讨论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只是画在墙上的门，并没有提供出路。

跨文化研究并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关注他者智慧的思想方法。他者的意义不在印证自我的那一面，而在自我无法理解的那一面。后殖民主义理论对西方现代性知识体系，既是摧毁性的，也是建设性的。摧毁性表现在其普遍怀疑主义的解构性批判上，

建设性则表现在西方文化自身包容对立面的辩证的开放性上。跨文化研究在西方文化传统内批判西方现代性，构成西方主流思想的对立面，恰好以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方式，加强了西方文化传统的活力。西方现代性文化包容对立面，表现在知识与制度不同层面上，为批判精神、为民主制度。理解这一点，才能够懂得后现代学术在西方思想语境中的积极意义，它以自我否定的方式完成自我肯定的意义。同一种思想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意义是不同的。后现代文化批判理论进入中国，中国学者关注其摧毁性，忽略其建设性，以为后现代思想颠覆了西方现代性与启蒙传统，西方的没落已经没落在思想传统上，误解是不明白理论，而是不明白不同文化语境中理论的意义。

跨文化研究关注理论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不同的意义。西方后现代思想进入中国语境，可能为前现代的中国立场与方法辩护。不了解中国，也不能了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中国意义。西方文化语境中，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意味着西方文化自身的开放与包容性以及自我反思与批判的活力；而在中国，却可能转化为自我封闭自我肯定的前现代文化偏见，为褊狭的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的民族主义所利用。我们惯于在中西方或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下思考问题，凡是西方对的，我们就错；凡是西方错的，我们就对。即使是否定西方的思想，思想方式也是西方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属于典型的后殖民主义文化遗产。西方后现代理论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在潜意识中成为中国前现代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证明，这种观念愚昧而危险。一则西方后现代的思想解构不仅不意味着西方的衰落，反而表现出西方文化特有的生机，二则即便是西方现代性存在问题，也不能说明中国传统就是完美的。

跨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与中国方法，在于超越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回应中国文化自觉与文明崛起的时代问题。在全球化多元文化共生的环境中思考现代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重要的不是高谈多元共

处、多极均衡、和谐发展的理想，而是认清现实，积极面对文化多元主义背后的西方现代文化一元主义的强势冲击，焕发现代中国的文化创造力；不是一味到古代中国思想中寻找复兴的资源与灵感，从后殖民文化的西方中心主义滑到大国崛起梦幻的东方中心主义，而是冷静深入地思考，寻找一个跨文化的、超越的、普世的立场。孟德斯鸠先生曾这样自我检讨：“如果我知道一样东西对我有好处，但对我的家庭有害处，我会把它从心中驱逐出去。如果我知道一样东西对我的家庭有好处，但对我的国家不利，我会试着去忘掉它。如果我知道一样东西对我的国家有好处，但对欧洲有害处，或者说对欧洲有好处但对整个人类不利，我会将它视为罪恶。”

第三版前言

前言里面概括了学术界的最新研究进展,这些是需要补充到本书当中的。常言道,过去之所以令人感兴趣,是因为它是不断变化的。这些变化是通过修正旧答案,提出新问题,开辟新领域,发现新材料,变换新视角产生的。本书对中国与其他主要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中国与其他世界组织在不同阶段所形成的世界秩序,进行了细查探究式的分析。本书的涵盖面很广,因此研究的对象也一定会发生变化。书中运用的细查探究式分析方法是从李约瑟(Joseph Needham)和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那里借鉴过来的,前者的著作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最具权威性的书籍,后者的演讲无疑是查尔斯(Charles)以来剑桥大学最出色的。二者都既有分析又有综合,既有缜密的学术思考,亦有大胆的推测假设。本书出版以后,世界上发生的变化可以分为特殊的和一般的两个方面。在特殊变化方面,我们需要重点解释道教、宋朝的国家主义、货币的国际化 and 全球性消费主义这四个方面的研究进展。

首先,本书在第二章中探讨了唐朝的世界主义。现在,我们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道教上,因为道教既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要素,也是中国在国外产生共鸣的一个因素。20世纪最后25年在道教研究上取得的巨大进步,是汉学的其他领域不能比的。尤其是迈克尔·斯瑞克曼(Michael Strickmann)的著作,将研究重心从语言怀疑主义的哲学著作《道德经》,转向道家的经典《道藏》、《三洞》和《四辅》。在这个领域,斯

瑞克曼、内森·席文(Nathan Sivin)、吉拉尔迪特(N. J. Girardiot)、伊莎贝拉·罗第诺特(Isabelle Rodinot)的研究,清楚地表明道教在历史中不像李约瑟认为的那样,是带有原始科学色彩的自然主义,而是宗教神灵显现的延续,其主要兴盛期可以追溯到晚古时期。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启示宗教、神秘宗教,揭示的是宇宙元素的相生相克,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完美境界,这种境界由男女神职人员组成的天国管理机构掌管。随着道教的兴起,一些精英人士开始信仰宗教,这就形成了晚古时期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那时,佛教虽然是主流,但并不是惟一的宗教。

晚古时期,道教获得了极高的地位,唐朝时期,它已成为一种家庭宗教,而且还远不止于此。最近,巴雷特(T. H. Barrett)分析了唐朝几位皇帝对道教的庇护。^[1]公元624年,唐高祖将道教置于儒教、佛教之上;公元637年,唐太宗进一步巩固了道教的地位;唐高宗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大的作为,但对道教特别支持,因此他不完全是其皇后武则天的陪衬。武则天也不是全心地支持佛教,但道教的确是在巴雷特所说的唐朝复兴期,特别是睿宗时期,才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和其他方面一样,道教在武则天的孙子——玄宗统治时期达到顶峰。道教尊老子为道祖,颇受社会重视,道观遍布全国,科举考试也以道家经典为惟一的范本,家家户户都有《道德经》。正如苏珊·卡西尔(Suzanne Cahill)指出的,道教的宗教意象渗透到当时的文学里面,是诗歌的最高意境。^[2]道教中引人注目的人物是玄宗的妃子杨贵妃,她甚至被称为西王母,是道教重要的女神仙。杨贵妃还被喻为牡丹仙子,她的悲剧性死亡以及诗歌中对贵妃之死的描述,一直到安禄山叛乱之后都是当时人们关注的焦点。

道教在许多层面对唐朝产生了影响。在政治层面上,它使西北部具有一半土耳其血统的贵族汉化,为新的朝代培养了臣民,就像佛教的天台宗之于此前的隋朝一样。道教尊重技术,这对知识界的精英来说是一种鼓励。中国文化源头中的道家思想一点不亚于儒家思想,在唐朝创建中华帝国圈、构建卫星国的过程中,道教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直到后

来这个帝国圈才开始接受儒家思想。在社会层面上,道教创立了新的人际交往方式。道教产生以前,中国主要是以亲缘关系为纽带。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道教提升了医患之间的关系,因为从许多层面上讲,道教本身就是一种治疗。佛教为男女平权作出了贡献,这一点学者们在对中国唐朝的研究中已经注意到,道教做得不比佛教少,甚至比它做得还要多。道教的神力是雌性的,在道教中占有首要地位的茅山派,其开山祖师就是一位女性,此外还有很多女性得道者,几位政治上十分活跃的皇室公主也信奉道教,做了道姑。道教在管理上不像佛教那么严格,使一些世俗平民和女性也能够加入其中。在经济层面上,就我所知,虽然没有人对谢和耐(Gernet)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源是从佛教到道教的观点提出疑问,但李约瑟推想资本主义在熟练的城市手工业者,比如拥有专门技术、专门知识、商业秘密以及火药神秘配方的人那里得到最广泛的支持的观点,也不是没有道理。应该记住的是,这一切都可能和道教有渊源关系。在知识层面上,道教使唐代的中國多元化了,也带来了学术论争的机会,而多元化和学术论争是人类知识生活的两个先决条件。道家无形但富有启发性的混沌宇宙论,一方面是一种系统的理论,对佛教的批判形而上学进行了补充,另一方面,也是反对偶像崇拜、不信神的儒家纯文学的一部分。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老子作为大师和信徒,曾到域外游历。道教是唐朝世界主义的一个重要反映,后代王朝对它的限制是中国知识界思想狭隘的一个征兆。

第二,本书的第三章探讨了中世纪盛期将拉丁基督教国家和传统中国划分开来的方法。现在看来,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宋朝的国家主义上面,因为这是中国在那时兴盛和后来衰落的主要原因。这种重新评价是保罗·史密斯(Paul J. Smith)和理查德·冯·葛兰(Richard von Glahn)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来的,虽然他们的探讨以四川为核心,但具有普遍的意义。^[3]宋朝和唐朝不一样,放松了对土地的管理,在对外

政策上奉行一种从根本上说防御性的、不扩张的政策。但在经济领域中的商业方面,在战略战术上具有一定优势的边界地区,宋朝又表现得比较激进,特别是在王安石的《新法》实施之后。王安石很不简单,与批评他的人不同的是,他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区分开来。事实上,那些批评他的人中多数最终也变成了国家主义者。王安石的基本思想是:用国家财富的增长来支付深层防御体系的开支,以静制动,用中国的稳定来对抗内陆亚洲的游动。其中的一项花费是进口西北边疆需求的马匹,《新法》希望通过从四川向陕西的茶叶贸易垄断和从山西向四川的盐业贸易垄断所获得的收益,来支付进口马匹所需的费用。在四川的官僚企业中——史密斯如此称呼,四川的茶叶和马匹经营在风险管理、激励措施、信用付款、开辟市场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专业水平。此外,由于其目的是进行扩张,而阻碍之一是当时富豪们的不积极参与,因此宋朝的国家主义有时也在小范围内支持发展资本主义,这样,在国家主义和私有经济这两个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这种暂时的联合并没有持续多久。四川的茶业只剩下从打箭炉^①贩卖到西藏的雅州砖茶,山西的食盐外运也因四川新开了私人盐井而受到影响。宋朝变成了一个寄生政府,受到自己臣民的遗弃。宋朝时期的中国远远不是大卫·塞尔本(David Selbourne)在其出色的当代寓言中描述的是市场经济的范例,而是一个隐性花费远远超过显性收入的国家主义实例。^[4]

第三,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主要论述了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的中国,其实整本书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但现在我们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探讨中国的货币发展史上。其实,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因为理查德·冯·葛兰在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中,用现代货币主义和后货币主义理论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说明。^[5]正如费正清(John K. Fairbank)详细阐释了中国的外交文献一样,冯·葛兰详细分析了中国的货币文献,即用

① 清雍正时置打箭炉厅,治打箭炉,即今四川康定。——译者注

语言写成的文本来解释语言表述的内容。关于货币的论争时常会发生,货币政策也常常发生激烈的变化,这些论争和变化第一次让人觉得可以理解为何货币发展史代替了货币学。就本书的主旨来说,有两点尤其重要。首先,总的来说,中国货币对其他主要文明的影响和世界市场萌芽的出现,应该视之为中国自身积极的货币需求,而不是被动地调节贸易平衡的结果。中国对货币的使用量,远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要多。中国从宋、元和明朝初期,由使用国家强制发行的纸币,转向使用市场上更受欢迎的白银,标志着国家主义的衰退,这在世界和中国货币发展历史上都是一个重大事件,同外国的贸易没有任何关系。其次,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我过去曾采纳肖奴(Chaunu)的观点,认为中国通过削减从新世界进口白银而被动地应对17世纪的普遍危机,现在看来这一观点在事实和理论上都有矛盾之处。当然,我们没有把话说死。冯·葛兰给货币下的定义,对中国当时这样一个国家造币厂、私人铸币厂、商品流通、各种各样的国家货币银行和私人信用证共同存在的情形来说,显得过于狭窄了。此外,不管怎么界定,对于货币供应、价格浮动、使用层次同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人们都没有一个清楚的了解,这一点在中国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一样的。不过,冯·葛兰的观点有其可取之处,如果要对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必须吸纳他的观点。

第四,特别是在第五章中,现在能够用更多的细节来剖析中国对另一个世界组织——消费团体的形成所作的贡献。这儿的消费主义不是指奢侈、铺张或过度使用,而是指消费趣味、消费时尚、消费的趋异性和个人喜好,可视为人在心理上对食物、服饰、住房、日用品、信息以及符号表象的物质追求。近期对商品的研究大大扩展了我们的知识。罗伯特·芬莱(Robert Finlay)的研究为揭开瓷器这一中国最了不起的创造物之谜,提供了更丰富的知识、更宽广的视角。^[6]瓷器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要晚,景德镇拥有大规模的瓷器制造业,德尼·龙巴

尔(Denys Lombard)认为这是中国受伊斯兰影响的一个例子。白底蓝花的瓷器是用中国的瓷体、波斯的颜料合制而成的,在被中国人作为一种具有异国情调的国内产品接受之前,主要用来出口到国外。由于瓷器较重,不能像丝绸那样走陆路,而是走水路。出口到国外以后,瓷器被拿来代替盘子,成为社会身份的标志,是一种文化避邪物,也是新风尚的媒介,常常是女性优雅的表现。人们通常认为糖是伴随着瓷器出现的,在这方面苏薛塔·玛祖达尔(Sucheta Mazumdar)^[7]的著作以及弗朗西斯·萨班(Francoise Sabban)对它的评论,为研究16、17世纪消费工业发展中技术所起的作用,打开了新的视野。不管立式轧机、三滚轧机以及过滤装置(糖的分离和盐的结晶正好相反)技术如何优先,贸易和国外市场是首先要考虑的,至少在中国是这样。就像老皮特(the elder Pitt)所言,任何人都不应该看不起糖业生产,因为如果说企业是在盐业中诞生的,那么制糖业则使它走向成熟。药品是跨越文化屏障的第二个武器,克利福德·福斯特(Clifford M. Foust)为研究药用大黄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8]关于大黄向西方的传播,我们现在可以放在当前流行的盖林(Galenism)^①医药哲学背景下加以研究。帕拉塞尔主义(Paracelism)、荷兰经验主义以及对病人的关心,在与儿童高死亡率的斗争中是十分必要的,但信息是最基本的资源。迪迪尔·葛扎纳都(Didier Gazagnadou)研究了邮政的中国渊源和在西方的发展。邮政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早期信息传递机构,在中国仅局限于官方使用(尽管私人邮政也存在),而在西方,米兰公爵(Duke of Milan)则开办了私人信函业务。^[9]

就世界历史的总体来说,我还想谈一下总的看法。把蒙古崛起以后的世界历史看作多种多样世界组织的产生过程,并认为这些世界组织比四大文明中的两个或多个具有更高的价值,这种思路目前来看还需要进

① 盖林:古希腊名医。——译者注

一步的讨论。语言和其所指要区分开来,世界历史这个词可在许多层面上用于探讨历史问题。我们认为,世界历史这个词非常有用,有助于世界历史的边界化、专门化、专业化,避免将世界历史变成全部的历史,从组织研讨会、课堂作业、学期论文来看,世界历史都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我在本书中只列举了四大主要文明,这已招来了质疑,特别是一些南亚学者的质疑。今后在回答他们的质疑时,我会强调世界历史这个词的本义,同时我并没有否认该词在雅利安语系(Aryan)或德拉维—印第安语系(Dravidian-Indian)中具有深远原创性的意思。从世界历史这个词的引申义着手,通过分析文明的发展脉络,来研究探讨世界历史,这是一种传统的方法,现今仍有一些卓越的学者采用这种方法,但我不采用。^[10]最后,有人认为我把早期世界组织的形成太多地归结于蒙古的崛起,而对伊斯兰的贡献考虑得太少。^[11]这是一个对具体事实、精确史料进行细节分析的问题,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蒙古崛起之所以产生了这些结果,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及环境有关,而这些结果有很多是源于伊斯兰的。对于这个问题,还有探讨的余地,特别是对于马穆鲁克人(Mamluk)^①和东南亚伊斯兰城邦国家,还有很多探讨的空间。

本书的第一版是献给乔·弗莱彻(Joe Fletcher)的,他那“甜美的声音,就像令人无眠的夜莺的歌声”,依然回荡在耳畔。在此书的第三版中,我要向另外一个开阔我眼界的人——泰德·法默(Ted Farmer),表达我的感激和谢忱,1997年秋天,他在明尼苏达(Minnesota)州邀请我参加一个世界历史研究项目。在世界历史研究方面,法默教授是独树一帜的,这一点他当时已当之无愧。泰德·法默生于加州,曾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接受教育,后来定居在双子城,他对不同的国家有着最为全面的了解。

① 马穆鲁克人:中世纪埃及的奴隶骑兵,亦译为马木留克人。——译者注

注释:

- [1] T.H. Barrett, *Taoism under the T'ang: Religion and Empire during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History* (Wellsweep, London, 1996).
- [2] Suzanne E. Cahill, *Transcendence and Divine Passion: The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in mediev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1993).
- [3] Paul J. Smith, *Taxing Heaven's Storehouse: Horses, Bureaucrat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ichuan Tea Industry 1074-1224* (Harvard, Cambridge, Mass., 1991); Richard von Glahn, *The Country of Streams and Grottoes: Expansion, Settlement and the Civilizing of the Sichuan Frontier in Song Times* (Harvard, Cambridge, Mass., 1987).
- [4] David Selbourne, *The City of Light* (Little Brown, London, 1997).
- [5] Richard 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96).
- [6] Robert Finsay, 'The Pilgrim Art: The Culture of Porcelain in World History', unpublished paper.
- [7] Sucheta Majumdar, *A History of the Sugar Industry in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cash crop in Qoangdong 1644-1886* (UMC, Ann Arbor, Michigan, 1994); Francoise Sabban, 'L'industrie sucrière. Le moulin à sucre et les relations Sino-Portugaises aux XVI^e-XVIII^e siècles',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49. 4 July-August 1994, pp. 817-864; Sidney W. Mintz,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Viking, New York, 1985).
- [8] Clifford M. Foust, *Rhubarb: The Wonderous Dru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ew Jersey, 1992).
- [9] Didier Gazagnadou, *La Poste à Relais: La Diffusion d'une technique du pouvoir à travers L'Eurasie China, Islam Euriope* (Editions Kimc, Paris, 1994).
- [10]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1996).
- [11] Janet L.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4).

导 言

本书讲述中国的历史,我们希望它能比通常的历史书对西方读者更有价值。中国历史不是孤立的,而是世界的一部分。本书的主题是中国同西欧亚(Western Eurasia)、非洲、美洲几个主要文明的关系,以及中国同新兴世界秩序或曰超级文明的关系。这不是中国历史的全部,但的确是西方读者应该了解的最重要的部分。新兴世界秩序主要是由西方规划和建构的,但中国对此作出的贡献比我们通常了解的要大得多,不将中国考虑进去,世界现代史图画就会缺失一角。

就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关于中国历史的总体性介绍有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Le Monde Chinois*)。关于中国同外部世界某些方面关系的著作,有李约瑟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关于唐朝的《撒马尔罕的金桃》(*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费正清和其同事关于外交的《中国的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路易斯·德尔米尼(Louis Dermigny)^①关于启蒙这

^① 路易斯·德尔米尼:法国学者,他于1964年推出了一套令人震惊的博士论文《中国与西方:1719年至1833年广州的对外贸易》(*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ll XVIII^e Siècle, 1719-1833*),收入《港口·道路·贸易丛书》。全书共有五大卷,洋洋400余万字,创下了由一名学者独自撰写的博士论文之最。其第一卷是《东印度公司时代》,第二卷是《茶叶时代与中国的债务》,第三卷是《广州与鸦片的时代》,第四卷是有关18世纪广州对外贸易的地图、图表和照片,第五卷是《夏尔·德·康斯坦中国贸易回忆录》。全书最后是《结论》,讲到了自由贸易、帝国与海洋、贸易结构与背景。这套书是20世纪60年代之前西方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对外贸易史的集大成之作。——译者注